

牧区旅游发展中的人口流动与复合生计 ——以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为例

包桃林

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收稿日期：2026年8月29日；录用日期：2026年9月23日；发布日期：2026年10月8日

摘 要

牧区旅游发展不仅带来游客流动，也改变了地方人口进入与家庭生计安排。以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为个案，本文基于实地访谈资料，考察牧区旅游发展如何创造经营与服务机会。研究发现，旅游发展通过景观开发、线路整合和服务需求扩展，使原本以牧业生产为主的地方空间逐渐具备接待、经营和服务功能；人口进入之后，当地家庭并未由牧业直接转向旅游业，而是在原有牧业基础上叠加旅游接待和配套服务，形成“旅游 + 牧业”的复合生计方式。牧区旅游发展的社会意义，不仅在于促进增收，更在于重新塑造地方人口进入条件和家庭生计组合方式。

关键词

牧区旅游，人口进入，复合生计，地方嵌入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Composite Livelihoo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astoral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Naomugeng Sumu, Siziwang Banner,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Taolin Bao

College of Ethnic Studies and Anthrop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Received: August 29,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23, 2026; published: October 8, 2026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pastoral tourism not only drives the flow of tourists, but also reshapes the

access conditions for local populations and the livelihood arrangement of local households. Taking Naomugeng Sumu in Siziwang Banner of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the development of pastoral tourism creates business and service opportunities based on field interview data.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rough landscape development, route integrat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service demand, tourism development endows the local space, which was originally dominated by pastoral production, with functions of reception, operation and service gradually; after the entry of population, local households have not directly shifted from pastoral industry to tourism, but superimposed tourism reception and supporting services on the basis of original pastoral production, forming a composite livelihood mode of “tourism + pastoral industry”. The social significance of pastoral tourism development lies not only in promoting income growth, but also in reshaping the access conditions for local populations and the combination mode of household livelihoods.

Keywords

Pastoral Tourism, Population Access, Composite Livelihood, Local Embeddednes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一) 研究背景：生态转型与牧区人口流动问题

在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和牧区产业转型的背景下，北方牧区正经历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随着生态保护要求强化、生产成本上升以及家庭教育、医疗、养老等现金支出增加，单纯依靠传统牧业维持生计的压力逐渐显现。如何在不脱离牧业生产基础的前提下拓展收入来源，成为牧区发展的现实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牧区旅游逐渐成为牧区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式。旅游业依托草原景观、生态资源和民族文化，将原本主要服务生产生活的地方资源转化为具有经营价值的旅游资源，并带动餐饮、住宿、运输、维修等服务发展，不仅为牧民家庭增加收入来源，也改变了地方就业和经营机会的分布。

从人口流动和地方社会变化的角度看，旅游发展不只是带来游客和收入增长，更会改变人口进入地方社会的条件。在牧区，本地外出者、外来经营者和流动服务者可能围绕旅游形成新的进入路径，“人口进入”比“人口回流”更能概括这一过程。

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为上述问题提供了典型案例。该苏木长期以畜牧业为主，近年来依托胡杨林、丹霞地貌、敖包祭祀和航天文化等资源发展旅游，地方资源纳入旅游线路，带动牧家乐、民宿、餐饮等经营机会，使本地返乡者、外来经营者和流动服务者获得进入地方旅游经济的机会。

基于此，本文以内蒙古自治区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为个案，重点讨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牧区旅游发展如何创造新的经营和服务机会；第二，本地返乡者、外来经营者和流动服务者如何进入地方旅游经济；第三，人口进入如何影响牧区家庭复合生计的形成及地方服务关系的调整。

2.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 文献综述

近年来，围绕乡村振兴、生态资源转化、返乡流动与地方社会重构的研究逐渐增多，这些成果为理

解牧区生态旅游发展中的人口回流问题提供了重要基础。关于生态资源与乡村发展的讨论,学界较多关注自然资源如何在政策引导、产业开发和市场组织中转化为现实的发展资源。相关研究指出,乡村发展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农业生产,而是越来越多地依托资源激活、主体协同和产业融合,向文旅结合的新业态延伸。民族地区和草原牧区旅游研究,则把这一问题放到更具体的区域经验中展开。有研究指出,民族地区旅游发展既不能完全依赖外部资本推动,也很难仅靠地方资源自发运转,更常见的是在地方资源、社区认同、多元主体参与和外部支持之间形成某种协同关系[1]。草原牧区旅游研究则更强调“旅游+文化”“旅游+牧业”等融合形态,认为草原旅游的吸引力不仅来自生态景观,也来自游牧文化、民俗体验和牧业生活方式,旅游发展由此成为牧区拓宽收入来源、推动产业转型的一种现实路径[2]。牧区生态旅游并不只是发展一项新产业,而是生态资源、文化资源和地方社会资源被重新组织的过程。

牧区社会转型的逻辑与一般农区并不相同,牧民流动也不能简单理解为“离土离乡”或“永久脱农”。相关研究注意到,在城镇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牧民的生计方式、生活空间和社会身份都在发生变化,“非牧化”所涉及的并不只是职业转移,也包括空间迁移和社会角色的重组[3]。传统牧区并未普遍形成大规模、稳定且彻底的“离牧”趋势,更常见的是牧业户、兼营户、非经营性牧业户与非牧业户并存,畜牧业仍然是多数家庭的重要经济基础[4]。这意味着,牧区转型更接近于多种生计形态并存和重新组合,而不是一种生计对另一种生计的简单替代。随着教育、医疗和公共服务不断向城镇集中,不少牧民形成了“生产在牧区、生活在城镇”的流动定居模式,在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之间维持双重联系。牧区人口流动本身就带有明显的双栖性、阶段性和空间弹性,特色畜牧业和生态旅游等新产业机会,也会影响青壮年是否留在牧区或回到牧区发展[5]。

关于返乡决策的研究,则把问题进一步推进到“为什么回流会发生”。现有成果大多不再把返乡简单理解为收入差异驱动下的个体选择,而是更强调家庭责任、生活预期、地方联系和社会关系的作用。无论是关于回乡民工“去还是留”的分析,还是对高学历小城青年、“回县青年”择业选择的讨论,都提到婚姻、生育、父母照料、子女教育、风险认知、熟人社会和对稳定生活的期待,会显著影响个体的流动方向和返乡方式[6]-[8]。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到,返乡并不只是经济收益比较的结果,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回归,它往往与家庭结构、地方社会和生活秩序联系在一起。

返乡并不意味着简单回到传统农业或原有职业,而往往伴随着家庭劳动力配置、收入结构和经营方式的重新组织。关于青年职业农民和返乡创业青年的研究表明,返乡主体通常会在市场机会与地方资源之间重新建立连接,把现代经营理念、政策资源与地方社会关系结合起来,形成兼具现代性与乡土性的经营实践[9]。返乡不是一个自动完成的过程,回到地方社会也不等于立即完成社会融入。返乡主体能否稳定立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重新建立与家庭、亲属、熟人网络和地方公共关系之间的联系[10][11]。与此同时,关于返乡青年和乡村旅游治理的研究也表明,返乡和旅游发展往往不只是劳动力重新配置的问题,还可能带来生计空间、生活空间和地方治理结构的调整[12][13]。这些讨论为理解人口回流后的生计重组、乡土嵌入和社会重构提供了重要启发。

综观既有研究,仍有两点不足。其一,多数成果或将“旅游机会如何生成”与“人口如何进入”分置于不同议题,或只关注进入之后的生计结果,较少将“旅游机会生成-人口进入-进入影响”置于同一分析过程中加以考察;其二,北方草原牧区的经验研究相对不足,对外来经营者进入、流动服务者参与等现象关注不够。基于此,本文从“人口进入与复合生计”的角度展开分析,尝试在牧区旅游发展、人口流动与家庭生计之间建立统一的解释框架。

(二) 分析框架

本文将牧区旅游发展理解为地方机会结构变化的过程[14][15]。本文将牧区旅游发展理解为地方机会结构变化的过程。旅游发展首先通过景观开发和服务需求扩展创造经营机会,这些机会在家庭责任、既

有经验、进入成本作用下，转化为本地返乡者、外来经营者和流动服务者的进入，进而推动牧区家庭形成“旅游 + 牧业”的复合生计，由此形成“旅游发展 - 机会生成 - 人口进入 - 复合生计 - 地方嵌入”的分析框架。

为深入调查牧区旅游发展与人口流动的关系，笔者于 2025 年 8 月和 2025 年 12 月两次进入田野，访谈返乡经营家庭、本地旅游经营户及进入当地从事餐饮、住宿、维修和配套服务的经营者共 15 户，并对脑木更苏木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访谈。

3. 牧区旅游发展与地方机会生成

(一) 景观开发与服务需求的出现

脑木更苏木位于四子王旗北部，地貌以戈壁丘陵和草原景观为主，生态环境较为脆弱，但并非没有资源，只是这些资源过去更多停留在地方生活之中。近年来，胡杨林、丹霞地貌、敖包祭祀和航天文化等资源被纳入旅游路线，加之公路和线路整合完成，景观可达性增强，当地进入更大的旅游流动网络。

资源被线路化、节点化和可抵达化之后，最先出现的并不是成熟产业，而是游客在进入过程中形成的服务需求。旅游发展带来的变化不只是“游客变多了”，而是使原本以牧业生产和家庭生活为主的地方空间叠加了消费和服务功能。

(二) 家庭经营空间的扩展

脑木更苏木的旅游发展没有主要依赖大型企业进入，而更多在本地家庭和个体经营基础上展开，旅游是在原有住房、院落、饮食方式和牧区生活资源之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经营实践，家庭空间也因此兼具生活、生产和接待三种功能。

一些家庭在现有房屋和日常生活条件上进行改造，通过搭建蒙古包、增加餐饮区域等方式直接参与旅游接待。“以前就是养牛养羊，但我家就在胡杨林边儿上，游客多，就搭了蒙古包，开了牧家乐，也不耽误放牛羊，还能有一笔收入。”(DGL, 女, 蒙古族)旅游经营由此成为家庭空间之上叠加出的新用途，而非对牧业空间的彻底替代。

除了直接接待游客的家庭，关联性服务也在扩展。一些不经营民宿和牧家乐的 household，通过拉菜、拉饲料、供应食品和临时运输等方式进入旅游链条。JRGL 购买小型农用车后，为周边牧家乐和饭馆从镇上拉菜、拉饲料，“挣的都是现钱”，同样依赖旅游服务需求的增长。

(三) 家乡重新具备经营和就业意义

地方机会结构的变化，不仅体现在服务需求出现和家庭空间扩展上，更重要的是，家乡开始重新具备承载就业和小规模经营的现实意义。过去，在牧业收入波动和本地非牧就业不足的情况下，一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以获取现金收入。

但这种外出并不意味着与家乡切断联系，外出者的家庭责任和生活安排仍围绕家乡展开。当本地出现餐饮接待、住宿服务和运输配送等机会时，家乡不再只是维持牧业和照料家庭的地方，也成为能够带来收入、容纳劳动和组织经营的空间。

这种变化首先增强了家乡对本地外出人口的吸引力。与在城市就业相比，返乡从事旅游服务或家庭经营，不仅能够获得收入，还可以兼顾老人照料和子女陪伴；熟悉本地环境、掌握牧区生活方式、了解地方风俗和民族文化，本身就构成了进入旅游经营的现实优势。

4. 牧区旅游发展中的人口进入类型及影响因素

(一) 本地外出者的返乡进入

对本地外出人口而言，是否返乡并不只是收入高低的比较。外出务工固然能提供现金收入，但老人

照料、子女陪伴等问题突出；返乡从事旅游经营虽有风险，却能把收入与家庭生活重新结合起来。因此，旅游机会之所以能吸引返乡者，在于它与家庭责任和地方生活之间具有较强衔接性(尹永强，2025)。

既有技能和职业经历也会影响人口进入的方向。对曾长期从事餐饮、服务业和个体经营的人来说，旅游发展带来的不是陌生新产业，而是原有经验得以重新利用的地方性场景。WNGRL 夫妇原先以畜牧业为生，后在乌兰花镇经营餐饮，返乡后养牛养羊的同时购置蒙古包经营牧家乐，将餐饮经验与家乡旅游机会结合起来。

(二) 外来经营者和流动服务人员的市场进入

进一步看，这类机会的吸引对象并不只限于本地牧民。随着游客数量增加和服务需求扩大，脑木更苏木所形成的经营空间，也开始对原本在城镇中从事个体经营的人产生吸引力。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未必与当地具有原生性的乡土联系，也不属于“返乡”意义上的人口回流，但旅游带来的消费需求以及配套服务供给的不足，仍然使脑木更苏木成为一个可以进入的小规模经营空间。也就是说，旅游发展所打开的，并不只是本地外出人口返乡的通道，同时也吸引了一部分外来经营者和流动服务者进入当地。

“我之前在镇上修理铺负责补胎，经常接到能不能外出补胎的电话，都是大车司机，时间长了，打听了一下才知道，从一矿拉矿石、从二连口岸拉货的大车大部分都选择走 928 县道。我就买了一辆二手依维柯，去脑木更专门做流动补胎了。还在公社超市旁边租了间空房，不仅有车补胎，游客和牧民的车坏了，我也给修，比在镇上赚得多。”(CKT，蒙古族)

外来经营者和流动服务者的进入更多是机会导向的。他们缺乏原生性的乡土联系，进入当地主要依赖经营经验、灵活性和成本控制能力。进入当地的机会并不完全来自狭义的旅游消费，也与道路交通、货运流动和沿线服务需求有关。换言之，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地方机会，有时会与交通流、运输流叠加在一起，共同构成外来服务者进入的现实基础。

(三) 人口进入的影响因素

不同类型人口的进入，最终改变的不只是若干家庭的生计安排，而是脑木更苏木整体的人口流动格局。旅游发展之后，这种以外流为主的格局开始变化，地方不再只是劳动力输出地，也逐渐成为能够吸纳返乡者和外来经营者的空间。

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家乡功能的重新界定上。对一部分外出人口来说，家乡重新具有了收入获取和经营发展的可能；对外来经营者和流动服务者来说，这里也不再只是旅游线路中的一个经过点，而是一个可以停留、经营并嵌入的地方市场。

更进一步看，地方流动格局的变化还表现为流动形态本身的多样化。有人较稳定地返乡经营牧家乐，有人在旅游旺季阶段性返回，有的家庭通过成员分工维持返乡经营与外出务工，还有一些外来个体围绕维修、运输等环节进入当地，使地方社会形成了更具弹性和层次感的流动结构。

从社会学意义上说，这种流动格局的变化表明，旅游发展并没有简单消除牧区人口流动，而是改变了流动的方向、形式和组织方式：地方发展的结果不是“人都回来了”，而是家乡重新具备了配置人口和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并推动了家庭复合生计的形成与地方关系网络的调整。

5. 人口进入与“旅游 + 牧业”复合生计形成

(一) 牧业基础上的旅游经验叠加

人口进入地方社会之后，牧区家庭并未由牧业转向旅游业，而是更常见地形成“旅游 + 牧业”的复合生计模式：牧业仍是最稳定的生产基础，旅游经营更多承担现金收入补充和经营扩展的功能，两者更常表现为叠加关系而非替代关系。

这种复合生计还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功能互补性：旺季到来时，家庭把更多空间和劳动力转向接待、

餐饮和住宿服务以获取直接现金收入，淡季则继续维持牲畜饲养和草场经营。脑木更苏木由此形成了以牧业为基础、以旅游及配套服务为增量的复合生计格局。

与此同时，这种复合生计并不只存在于本地返乡家庭之中。一些并不拥有草场和牲畜的外来进入者，也通过运输、维修、餐饮等方式参与旅游经济，使脑木更苏木形成了围绕旅游发展延伸出的多层次生计网络。

(二) 家庭劳动分工与角色调整

旅游业进入家庭经济之后，变化不仅体现在收入来源增加上，更体现在劳动力配置和角色分工的调整上。与传统牧业不同，旅游经营对接待、联络、订单处理、餐饮服务和游客沟通提出新要求，家庭成员不再按原有牧业劳动逻辑单一分工：年轻成员更多承担前台和联络事务，年长成员更多维持牧业基础，女性成员在餐饮、清洁、接待和日常照料中的作用也更为突出。

YLLT 与 WL 的家庭案例能够较具体地反映这一变化。YLLT 此前在呼和浩特从事汽车保险行业，2020 年返乡后买下一排空房，翻新装修打造草原特色民宿，日常工作明显转向订单处理、游客接待和经营组织。他提到，“咱们民宿干净，条件好，每年六七月份来大红山的游客特别多，每天都住的满满的。旺季忙的时候，我就雇我姐姐来帮忙。”返乡者由此增强旅游接待能力，城市职业经验也被转化为本地经营能力。

与此相应，WL 的劳动内容更多体现家庭后勤与日常经营支持的重要性。她原先长期任教，学校合并后以放牧为生。2020 年三儿子返乡经营民宿后，她开始承担熬茶、做早点、打理菜棚、养鸡等后勤劳动，把家庭日常生产转化为经营支持。她提到，“我早上帮忙熬茶，做早点，每天打理菜棚，我还养鸡。游客都抢着买我的蔬菜和土鸡蛋了，纯天然有营养。”女性长辈由此成为家庭经营体系不可缺少的一环。

从整体上看，这种分工调整并不是对原有家庭结构的推倒重来，而是一种建立在原有家庭基础上的协作性重组：有人负责游客联络和线上订单，有人负责准备食宿，有人继续维持牲畜生产，并根据旅游旺季和牧业时序在不同劳动之间切换。

(三) 地方嵌入与社会关系的再组织

人口进入地方社会的意义，不止于劳动力回到家乡或进入地方市场，更在于不同类型进入者如何重新获得位置，并把新的经营活动嵌入既有关系网络之中。对脑木更苏木而言，旅游经营不是孤立的市场行为，而是深深嵌入家庭、亲属、邻里和熟人关系中的经济活动。

对返乡者而言，地方嵌入首先表现为对原有社会关系的重新调用。YLLT 在旅游旺季雇姐姐帮忙，说明亲属协作是家庭式旅游经营得以维持的重要条件，亲属关系能够分担经营压力、降低人力成本并在旺季形成灵活的劳动力补充。返乡者由此在地方较快站稳脚跟。

与此同时，地方关系的再组织也体现在旅游服务链条的延伸之中。“我以前就有一辆小车，就帮牧民们拉饲料赚点运费，这几年周围饭馆、牧家乐开的多了，也找我拉点菜、鸡蛋，我就又买了一辆小型农用车，给周围的牧家乐和饭馆从镇上拉菜、拉饲料，挣的都是现钱。”(JRGL, 蒙古族)地方关系网络由此围绕旅游接待和消费需求形成新的协作关系。

CKT 的进入路径则进一步说明，地方嵌入并不只发生在本地返乡者身上，也发生在外来经营者和流动服务者身上。

外来进入者虽然缺乏原生性的乡土联系，但会通过租房、维修、交换和日常接触逐步嵌入当地市场，并在地方服务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地方社会关系的重组并不只是“熟人关系复活”，还包括新的经营联系、新的服务分工和新的市场依赖关系不断生成。

从这一意义上说，人口进入带来的变化不只是“谁回来”或“谁进来”，更在于地方社会重新获得了组织经营、协调服务和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原本围绕牧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展开的关系网络，开始叠加游

客接待、物资供应、交通运输、维修服务和经营协作等内容,地方关系由此呈现出更强的组织性和服务性。

6. 结论

本文以脑木更苏木为例,讨论了牧区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人口进入、复合生计和地方关系变化。进入当地旅游经济的既有本地返乡者,也有外来经营者和流动服务者:前者更多依赖家庭责任和地方联系,后者更多依赖市场识别和经营经验,由此形成返乡与流入并存的多种进入路径。

但从现有材料出发,这种变化更适合被理解为一种建立在原有牧业基础上的扩展与再配置,而不宜过早将其概括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重构”。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在脑木更苏木这一案例中,旅游发展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它彻底逆转牧区外流趋势,而在于它使地方重新具备了吸纳劳动、组织经营和维持生活的部分能力,从而改变了人口去留的条件,推动家庭生计和地方关系发生有限但值得重视的变化。

同时也应看到,本文仍有明显局限:其一,现有材料主要来自自己进入经营活动的家庭和个体,对未进入者、失败者掌握不足;其二,旅游经营具有季节性,当地变化的长期稳定性还需更长时段观察。后续研究需进一步比较不同类型家庭在机会面前的差异性选择,并关注可能的经营风险、收入分化和进入门槛问题。

参考文献

- [1] 杨德进,冯雪,刘丽娟,等.新内源式视角下民族地区旅游驱动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J].旅游研究,2026,18(1): 31-43.
- [2] 郭景福,药劲松.乡村振兴视阈下呼伦贝尔草原旅游业发展[J].民族学刊,2022,13(6): 37-45+142.
- [3] 徐黎丽,乌日丽格.边境口岸区域牧民非牧化探析——以新巴尔虎左旗巴音塔拉嘎查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22,43(3): 120-127.
- [4] 范明明.牧民分化、牧业生产与传统牧区乡村振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个案考察[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3(5): 97-105.
- [5] 龙贺兴,隋颖.城镇化进程中边境地区牧民流动定居模式与影响研究——基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的调研[J].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5(3): 115-129.
- [6] 顾辉.去还是留?——回乡民工继续外出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J].当代青年研究,2012(1): 33-38.
- [7] 孙艺璇.谁是“闯荡的料”:高学历小城青年择业决策的文化逻辑——基于对E市40位青年的深度访谈[J].当代青年研究,2025(6): 1-19.
- [8] 刘畅.“回县青年”县域体制内就业及其成因[J].青年研究,2024(1): 67-78.
- [9] 王惠,韦陆星,吴惠芳.生存为大:大学生猪信何以可能?[J].当代青年研究,2025(5): 68-82.
- [10] 梁伟,陈锋.青年职业农民的乡土嵌入机制与村庄再造——基于D镇返乡创业大学生的案例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2(5): 111-118+110.
- [11] 万书润民.返乡小镇青年社会化的“脱栓”困境及其生成路径[J].理论月刊,2025(1): 106-116.
- [12] 闵兢,黄慧.返乡青年治村的实践逻辑与空间再生产[J].中国青年研究,2024(8): 50-59.
- [13] 储德平,谢芳,阙小乙.跨地方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过程与机制——以陕西省袁家村为例[J].地理研究,2026,45(8): 2422-2441.
- [14] Merton, R.K. (1959) Social Conformity, Deviation, and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 Comment on the Contributions of Dubin and Clowar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 177-189. <https://doi.org/10.2307/2089428>
- [15] Bernard, J., Steinführer, A., Klärner, A. and Keim-Klärner, S. (2023) Region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 Research Agenda to Link Spatial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in Rural Area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7, 103-123. <https://doi.org/10.1177/03091325221139980>